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2019年8月23日

第5期



10 特别策划

吉林省图书馆创新古籍保护和宣传方式

12 图书推荐

《御制圆明园诗》
《点注十八史略校本》

14 业务探讨

中国传拓技艺——石刻拓片的传拓

15 古籍史话

私家藏目向图书馆公藏书目过渡的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

16 镇馆之宝

绍兴图书馆之馆藏珍贵古籍

用心感受文化魅力 用爱传承中华文明

吉林省图书馆创新古籍保护和宣传方式

□赵宇波(吉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

中国历史悠久,典籍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今天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古籍保护是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古籍保护工作者的共同愿望。

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已经形成了从上到下、多方合作的较为完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通过十年摸底,古籍普查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初步摸清了全国古籍的基本情况。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在《“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的约束和指导下,已经形成了健全的工作机制、完备的工作队伍、合理的保护体系。在这样的形势下,形成了图书馆、高校、出版机构三方保护的一个工作链条,从基础的保护、深度的研究、广泛的出版传播等几个方面,构建了这个古籍保护体系,这都是目前古籍保护和传承的良好机遇。

以馆藏珍品为依托 开展古籍推广活动

吉林省图书馆作为这个保护体系中的一部分,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框架下,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对本馆的古籍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我馆是第二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首批吉林省重点古籍保护单位。馆藏古籍23617部,23万余册(件),其中善本古籍4601种,唐宋元珍本38部。已有214部珍籍先后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尤以宋元刻本、写本与稿抄本、宝卷、东北地方志等的收藏为突出特色。馆藏珍品《佛说无量寿观经》抄写于唐代,流传千余年,既是艺术珍品,又是珍贵的历史文物;馆藏宋版《文选》全书六十卷,六十四册完整无缺,曾经吴元恭、唐伯虎、董其昌、潘允端、钱谦益等递藏。

近年来,吉林省图书馆十分重视古籍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和人员的培养力度。建立和完善全省的古籍保护工作体系,在古籍数字化、影印出版和整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吉林省图书馆每年都会选取馆藏珍贵文献进行影印再造,目前已经影印出版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辽西诗抄》《吉林省图书馆藏名人手札》等24部文献,形成了地方史料、稿抄本、印谱等系列特色精品;加强珍贵文献的整理工作,出版了《吉林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吉林省图书馆珍本图录》,并通过各类媒体刊登书志30余篇。古籍数字化工作是吉林省图书馆古籍保护的重点工作之一,多年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已搭建了数字资源发布平台,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发布古籍数字资源100部。

2017年,为实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目标,吉林省图书馆创建了国内第一家依托于图书馆馆藏的省级典籍博物馆——“吉林省典籍博物馆”,成功举办了“墨雅余香 纸润流芳——吉林省图书馆藏珍品展”“册府千华——吉林省珍贵古籍特展”等大型古籍展览,满足了民众体验典籍文化的需求,同时为束之高阁的典籍文化走出神圣殿堂发挥价值提供了舞台。

吉林省图书馆不断通过举办古籍基础知识问答、古籍修复知识讲座、雕版印刷、拓片制作等多种形式的活动,积极宣传古籍保护工作,并联合各新闻媒体发表专稿、专栏、专刊及新闻报道等,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古籍保护知识,提高公众古籍保护意识。“古韵传承”是吉林省图书馆推广古籍修复传统技艺的一个系列品牌,在古籍展览期间长期为读者提供体验服务,并每年围绕“世界读书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重要节点开展系列活动,近两年在图书馆、学校、社区、军营等各个场所举办活动10余场,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

古籍保护工作对于图书馆来讲,属于小众领域,对管理人员和保护、传承人能力也都有很高的要求。多年来,古籍保护从最初的藏而不用,到采用先进的藏用并举的工作模式,使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把古籍资源拿出来,供大众阅览和研究。就吉林省图书馆而言,一直在不断尝试新的技术和方法,从最初的文献缩微保护技术,到数字化、影印出版等手段的广泛运用,使得古籍资源得到更好的保存、管理和使用。

多方面破解难题 共担古籍保护使命

新媒体营造了一种数字化的新环境,在为古籍保护工作提供了新方法的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利用新媒体,做好古籍的阅读、推广、指导、交流、知识推送等工作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积极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完善公共图书馆古籍阅读服务模式,以适应现代化技术带来的巨大改变;积极与主流新媒体建立合作机制,利用不同传播渠道达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进行社会教育的目的。

现阶段,古籍保护工作如何保持长久的战斗力,如何解决保护与利用的“藏用”矛盾、经费问题、人才问题,如何利用有限的古籍资源最大程度地推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围绕当今社会的热点难点从古籍中汲取知识,如何通俗易懂地对古籍进行再阐释等各方面问题的有效解决,归根结底还是要维护好现有的古籍保护体系,发挥多方合作机制的优势。做好古籍保护工作,主要应该做好几项工作:构建古籍传承推广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速古籍数字化工作建设;广泛开展展览、讲座、文化普及等推广活动;推动文创产品开发;依托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多媒体平台,推动传统文化与先进技术相结合。

古籍是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优秀文化,古籍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是《公共图书馆法》对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一位古籍保护从业者需要用心去思考和专研的事业,其不仅仅是古籍保护从业者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用心感受文化魅力,用爱传承中华文明,理应是先辈之责,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应该支持古籍保护工作,通过一代代人的不断努力和大力传承,将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



2017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吉林行



“墨雅余香 纸润流芳——吉林省图书馆藏珍品展”



“古韵传承”系列活动——触摸“历史”、体验匠心

2019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在孔子博物馆启动

本报讯 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孔子博物馆、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央视网、(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少年分会协办的“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启动仪式不久前在曲阜举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图书馆、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图书馆、济宁市政府、曲阜市政府、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等单位的有关领导、知名专家及数千名群众参加活动。

“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启动仪式由孔子博物馆馆长孔德平主持,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饶权,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李国琳,大连图书馆原馆长张本义先后致辞。此次活动发布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孔子博物馆卷》、孔子博物馆藏《乾

隆御定石经—孝经》和《圣门礼乐志》。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中心孔子博物馆传习所自成立以来,开展了系列培训活动,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胡玉清老师的指导下,取得了丰富的修复成果。在此次活动的拜师仪式中,孔子博物馆三位优秀的古籍工作者向胡玉清老师行拜师礼,敬茶、献花。随后,与会嘉宾们参加了在孔子博物馆时习阁举办的晒书大会。现场展出了孔府珍藏的档案、古籍、拓片等珍贵文物藏品。在孔子博物馆时习阁举办的晒书大会。现场展出了孔府珍藏的档案、古籍、拓片等珍贵文物藏品。在孔子博物馆时习阁举办的晒书大会。现场展出了孔府珍藏的档案、古籍、拓片等珍贵文物藏品。

珍贵古籍名录》的清康熙二十八年《幸鲁盛典四十卷》,以及在碑帖普查编目培训过程中发现的《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和《圣门礼志》等古籍。晒书沙龙活动由央视网书画频道总监张筱雯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连锡,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大连图书馆原馆长张本义,著名藏书家韦力,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孔子研究院原副院长孔祥林,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冀亚平、古籍修复专家胡玉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李勇慧,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等参加了活动。大家围绕晒书传统和典故、儒家典籍中蕴含的历史智慧和精神价值、曲阜晒书等展开热烈讨论。



为避免典籍霉变生虫,中国自古就发明了晒书、曝书方法,汉代在农历七月初七晒藏书,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描述了晒书场景。北宋时期,宫廷内府晒书,书画也在七月七晒晒,官宦书香之家都以一睹宝藏为快。今年全国各地从阴历六月初六开始举办了各种丰富多彩的晒书活动。古籍收藏单位馆长、人文学者、保护专家、非遗传承人亲自晒晒国宝、晒经典、晒技艺、晒传统,通过丰富多彩的晒书大会、品书沙龙、系列讲座、珍品展览、交流互动,使公私藏家、广大民众一起分享古籍知识,传播保护方式。 刘远雷

“中华古籍资源库”已在线发布古籍资源3.2万余部

本报讯 2016年9月28日,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创建的“中华古籍资源库”正式开通运行,在线发布善本古籍影像10975部;2017年12月28日,又在线发布《越城金藏》1281部、善本古籍影像2070部……截至目前,“中华古籍资源库”已在线发布古籍资源3.2万余部,让全国超过60%的古籍善本资源实现在线阅读。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古籍保护经费的投入力度,每年用于古籍数字化工作的专项资金在1000万元左右。但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仅把现存已知20万个品种50万个版本的汉文古籍文献,每个品种和版本都选择一部进行数字化开发,加上图像采集、加工、标引、存储等费用,所需经费就高达60亿元,这还不算其他古代舆图、金石碑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外文善本等

特藏资源的数字化。“在有限的资金下,国图于2012年首先启动了馆藏善本缩微胶片的数字化工作。虽然它是黑白的,但成本低、进展快,目前已有近2万部古籍完成数字化。”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从2015年起,国图又陆续启动了“国家图书馆藏普通古籍数字化”“国家图书馆藏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数字化”项目,并积极开展各类特藏资源库,包括甲骨世界、碑帖菁华、敦煌遗珍等。如今,各类文献数字化已超过10万部(种)。

与此同时,许多古籍藏单位也加快了古籍数字化的步伐。共同的目标,让协作进程逐步加快。2014年底,天津图书馆向国家图书馆提供总量5800余种约300万拍明清版本古籍数字资源;2016年下半年,云南省图书馆将



139种727册95496拍的资源提供给国图……此外,近年来,国家图书馆还携手全国21家古籍收藏机构举办了3次联合发布活动,在线发布古籍资源超过1.7万部,赢得社会广泛关注。很长一段时间,学者在一些古籍藏单位提出借阅古籍时,有些馆会以“保护”为借口予以拒绝,但这种“深藏”的做法并不能发挥出古籍应有的价值。有关专家认为,推进古籍数字化服务已是趋势,数字化很好地解决了古籍保护与利用的矛盾。 李静

“第十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结业

本报讯 为期一个月的“第十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不久前在孔子博物馆顺利结业。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中心孔子博物馆传习所胡玉清、孔子博物馆馆长孔德平、副

馆长唐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庄秀芬出席了结业典礼。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是国家级古籍保护中心核心工作之一,到目前为止已成功举办各类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49期,培训学员

1480人次,使古籍修复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她希望各位学员能够带着收获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勤动手、多练习,继续开展古籍保护修复工作,为我们祖先文明

的流传多贡献一份力量。本期管理研修班由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老师为学员进行理论授课,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中心孔子博物馆传习所导师胡玉清老师、浙江图书馆副研究员汪帆老师开展具体的修复实践指导,累计完成104张石刻拓片、80张银票及部分孔府档案的修复。管理研修班以“师生研修”为教学模式,以“师徒带”为培训形式,以“珍贵古籍”为修复对象,通过集中研修,不断积累经验,用以推广并解决实际问题,目的是建立一支覆盖全国、面向省级保护中心的中青相结合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专家队伍,全面提升我国古籍保护工作水平。



第十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与工作管理研修班毕业典礼

西藏加速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本报讯 据新华社消息,西藏首个古籍数字化专业培训班不久前在拉萨结束。来自西藏各级图书馆、科研院校及布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等17家古籍收藏单位的35名相关人员参加了培训。据悉,西藏在全面加大古籍数字化人才培养同时,已启动建设“古籍共享数据库”。

此次培训是在西藏古籍普查进入收官阶段举办的。在为期5天的培训中,国家图书馆数字化专家、国内藏文古籍数字化专家等相关领域专家,结合古籍保护实际情况,从当前古籍数字化进展和设想、国家图书馆少数民族文献数字化工作情况、数字资源的保存与服务、藏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处理技术与应用示范、藏文古籍编目等方面进行授课。

藏文古籍作为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历史悠久,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然而,西藏多数古籍散存于遍及74个县区的1300多座寺庙内,点多面广、地处偏僻。

2009年西藏全面落实“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古籍保护。十年间,古籍普查人员走遍全自治区1160余家收藏单位,普查登记古籍文献13700多部,取得了《雪域宝典系列1-4》《西藏那曲、阿里古籍普查目录》《西藏自治区图书馆文集目录》等一系列数字化成果,为西藏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巴次仁说:“下一步,在开展重点古籍单位普查登记、全区古籍普查查漏补缺等工作的同时,将制定藏文古籍数字化标准,搭建服务全社会的藏文古籍数据库。”

西藏大学图书馆藏文文献部副研究员米次说:“此次培训作为西藏加快古籍数字资源建设的有力举措,将有效夯实古籍保护人员的古籍数字化理论与基础知识,为推动西藏古籍数字化工作更加科学、规范、有序开展打下基础。”



第三期古籍数字化理论与实践培训班



《御製圓明園詩》
编著者: (清) 高宗弘撰; (清) 鄂尔泰、张廷玉等注
定价: 280.00元
ISBN: 978-7-5013-6714-6
出版时间: 2019年6月
装帧: 精装
开本: 大16开
页数: 444页

内容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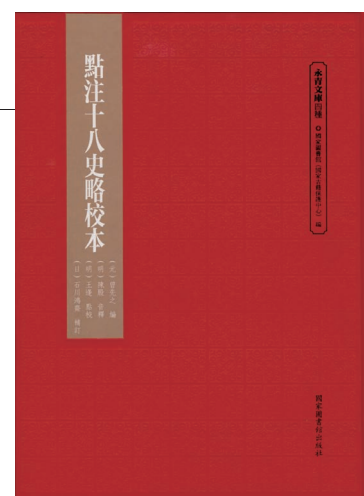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最初是康熙帝赐予胤禛的别苑。雍正三年(1725),雍正首次驻蹕圆明园,圆明园于是兼有“苑囿”和“官廷”双重功能,成为清代多位帝王的园居、理政之所。圆明园在雍正、乾隆两朝都有大规模的扩建。雍正时期,圆明园建成“正大光明”“廓然大公”等33景。乾隆九年(1744),圆明园四十景建成,其内各有殿阁、斋馆数处。同年,乾隆皇帝御制圆明园诗四十首,敕令宫廷画家唐岱、沈源绘制“圆明园四十景”图。乾隆皇帝《圆明园诗》应景而作,每景一图一诗,包括“正大光明”“九州清晏”“方壶胜境”各处景致。御制诗五言、六言、七言不限,古诗、绝句、律诗、词各体皆备,图文相应,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圆明园全盛时期的景象。此次影印清刻朱墨套印本,为国家图书馆藏“永青文库”选印四种之一。

作者简介

弘历(1711-1799),清朝第六位皇帝,定都北京之后的第四位皇帝。年号“乾隆”,在位六十年,禅位后又继续训政,实际行使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最长寿的皇帝。乾隆帝时期武功鼎盛,在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且完善了对西藏的统治,统一了新疆,正式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清朝的版图由此达到了最大化,近代中国的版图也由此正式奠定。乾隆帝在位期间,汉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民间艺术有很大发展。

鄂尔泰(1677-1745)字毅庵,康熙举人,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三年(1725)迁广西巡抚,次年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在滇实行改土归流,在西南各族地区设置州县,改土司为流官,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后任军机大臣。世宗死,受遗命与张廷玉等同辅政,总理事务,加至太保。乾隆十年(1745)以病解职。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入值南书房,进入权力中枢。康熙朝,官至刑部左侍郎,整饬吏治。雍正帝即位后,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拜保和殿大学士(内閣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完善了军机处制度。乾隆帝即位后,君臣渐生嫌隙,晚景凄凉,致仕归家。乾隆二十年(1755)卒于家中,享年八十四岁,谥号“文和”,配享太庙,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张廷玉先后任(兼任)平定朔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清圣祖实录》副总裁官、《明史》《四朝国史》《大清会典》《世宗实录》总裁官。



《点注十八史略校本》
编著者: (元) 曾先之编;
(明) 陈殷音释; (明) 王逢点校;
(日) 石川鸿斋补订
定价: 280.00元
ISBN: 978-7-5013-6719-1
出版时间: 2019年6月
装帧: 精装
开本: 大16开
页数: 714页

内容提要

《十八史略》为元代曾先之所撰,以时间为序,以帝王为中心叙述上古至南宋末年的史事。曾先之将书名定为《十八史略》,表示该书是对十八种史书的节略,所用史书是司马迁《史记》以下直至欧阳修《五代史记》的所谓“十七史”,宋代史事则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明代《十八史略》流传颇广,不断有人为之注释、修订。

《十八史略》日本藏有明初刊本,元和以后,出版了覆刻五山版的活字本。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对《十八史略》的讲习逐渐兴盛,各藩官学多采用《十八史略》作为童蒙之书,传播既广,影响渐大。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注本多达数十种。此后大量不同版本的《十八史略》不断出版,以“史略”为名的日本历史读物纷纷涌现,对日本社会文化产生广泛的影响。

此次影印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东京山中市兵卫刻本,为国家图书馆藏“永青文库”选印四种之一。

作者简介

曾先之,生卒年不详。字从野,宋元之际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乡贡进士。其事迹不见诗传。

陈殷,江西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县)人,明初的私家学者,为《十八史略》作音释,将之釐为七卷,他看到了《十八史略》适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并且通过音释促进传播,其史学普及意识是相当强烈的。

石川鸿斋(1833-1918),本名英,字君华,号鸿斋,别称雪泥居士。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画家。曾游历中国多年,加之长期苦读汉文典籍,让他拥有了极高的汉学素养与汉文写作功底。他一生著述等身,作品涵盖面颇广,主要有《日本外史纂论》十二卷、《文法详解》一册、《画法详论》三册、《诗法详论》二册、《书法详论》二册、《精注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十六册、《史记评林辑补》二十五册、《夜窗鬼谈》二卷等,共计五十余种。

“永青文库四种”出版说明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6月26日,日本前首相、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先生将36部4175册汉籍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图书馆,延续了历史上“以书会友”的友好交流传统,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批捐赠多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从儒家到诸子,从历史到文学,类型多样,保存完整,中日刻本俱在,是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例证。为纪念这次捐赠,国家图书馆特举办“书卷为媒,友谊长青——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以中日两国纵贯千年、源远流长的书籍之路

为主线,展示此批汉籍捐赠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国图还在善本书库内设立永青文库捐赠汉籍专藏,向读者提供原件阅览服务;启动了捐赠汉籍数字化工作,秉承“边建设,边服务”的原则,陆续面向公众提供数字影像查阅服务。

作为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国图在捐赠汉籍中,遴选出四部代表性文献,委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以期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之用。经部选用日本弘化四年(1847)影宋刻本《尚书正义》。该书宋刻在中国失传,幸由日本熊本藩时习馆影刻得以流传于世,是日本刊本中的名品。

史部选用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东京山中市兵卫刻本《点注十八史略校本》。德川幕府时期,日本讲习《十八史略》兴盛,诸藩官学多据为童蒙之书,对日本社会文化影响广泛。

子部选用日本天明七年(1787)刻本《群书治要》。此书为魏征主持编纂,用史事资政。该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被日本历代天皇及大臣奉为圭臬。由于该书在我国唐末时即已亡佚,直至九百年后的日本宽政八年(1796)才重为清代士人所知。中国改革开放后,习仲勋同志曾为《群书治要考译》一书题词“古镜今鉴”,明确此书的警世育人价值。《群书治要》的刊印,

是中日文化交流千年的历史见证。集部选用清刻朱墨套印本《御制圆明园诗》。这部汉籍原为清代宫廷画师为乾隆皇帝《圆明园诗》所作,每景一图一诗,反映圆明园全盛时期景象,印制精美,在我国存世稀少,借此影印得以推广。细川护熙先生为这次汉籍捐赠,曾经墨书题写“文章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以宣明文化典籍的重要功用。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舟楫往还、文化互鉴的邻邦。这次精心甄选影印的四种汉籍,将继续谱写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佳话,希望能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喜爱。



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

五洲传播出版社(以下简称“五洲社”)成立于1993年12月,现直属于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是一家专业的对外出版社。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为宗旨,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与国际合作,使用多种语言文字、多手段和多渠道,讲述中国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五洲社已经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现有在销图书近3000种,其中外文版图书2000多种,涵盖英、阿、西、法等十几种语言,内容包括中国基本情况、中国文化、中外交流、中国文学、涉藏涉疆、地方外宣、儿童图书、文创产品等多方面系列,深受外国读者和外国留学生欢迎。五洲社的图书产品已经传播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图书馆中国内容馆藏量上多年稳居全国出版社之首,版权输出数量连续多年名列全国单体社前列,是国家“走出去”工作重点出版单位和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五洲社以国家对外发展战略为出版方向,以外文版图书为出版特色,在全国1600多所开设外语专业的大中学校中,五洲社出版的外文版图书已覆盖90%院校的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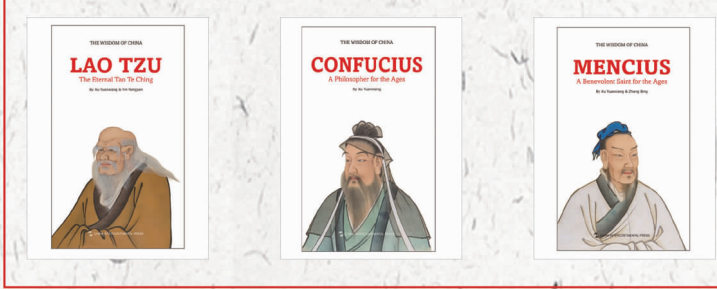
“人文中国”系列图书



“如果国宝会说话”系列图书



“中国智慧”系列图书



“唐诗宋词”双语手帐系列



“四大名著”系列图书(西语版)



“中华之美”系列图书



中国传拓技艺——石刻拓片的传拓

□袁玉红(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

传拓技术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传拓作为一种复制和保存文献资料的特殊方法,从古至今被普遍运用在金石文字及其图像上,尤其是石刻文字。运用这种传统的传拓技法为中华民族保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及书法史料,直至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传拓技术仍旧不可被其他高科技所取代,为传播我国的古老文化,保存人类的文化遗产作出卓越的贡献。

传拓的起源与沿革

所谓传拓,亦称捶拓,是中国特有的保存文献的传统方法。“传”与“拓”两字具有不同的含义。《字彙·人部》曰:“传,续也。”陆明德认为:“传者,相传继续也。”拓,就是用纸和墨从铸刻器物上捶印出其文字、图像或花纹。由于在传拓过程中要运用一套技术方法,故名传拓技法。又因此法主要应用于金石器物上,如拓印碑刻、墓志、甲骨、陶器、青铜铭文、玉器花纹、瓦当、画像、铜镜、货币、铜器器形等,所以也称金石传拓技法。

传拓是在刻石出现,纸张和墨广泛使用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东汉时期刻石大量出现,但刻石不便于移动,不利于阅读。特别是《熹平石经》被用作官定经本,也为了方便释读石经,复制碑刻内容成为当时人们强烈的愿望。我国最早的正式刻石的出现当从战国的“石鼓文”算起,从秦到汉代,刻石已有数百种之多,相当数量刻石的出现,为传拓技术的发明提供了重要条件。如果当时只有书写在一定载体上的文字而没有一定数量刻石的出现,就不会有传拓技术的产生了。

造纸术最早发明在西汉时期,公元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术,能够制造出质地均匀、品质优良,而且可以用来书写的纸张,纸张质量提高,成本下降,使得纸张能为一般人所使用,纸质的提高和使用也是传拓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就可以看到使用墨的迹象,殷墟甲骨上也有用墨痕迹,出土的战国和秦汉简牍也都是用墨书写的。东汉时期出现了较大的制墨作坊,而且这时官府已有管理笔墨和纸张的专职人员,可见当时墨的使用已经较为普遍。

传拓产生的时间目前尚无定论,最早记载拓本的书《隋书·经籍志》记载了汉魏石经毁于齐神武年间的史实,这里所记载的“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相承传拓之本”显然就是拓本。由此可见,最早在汉魏之间,最晚在南北朝时期,传拓就已经产生了。

我们通常所说的拓片或拓本就是运用传拓这种方法制作而成的。单幅拓片一般称为拓片,割裱成册的称为拓本。《温泉铭》是已

知现存最早的拓本。

传拓技术从发明到成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传拓技术发明之初,基本是应用于碑碣刻石,以取其铭刻文字,唐人拓碑已经相当普遍,如隋唐时期的石经拓片、碑刻拓片等。到宋代,随着传拓技术的不断提高,拓片已盛行风靡,刻帖业的兴盛,也进一步推动了传拓技术的发展,为后世留下许多珍贵拓片,当时对拓片就有“下真迹一等”的评价。明代在传拓技法、用纸及用墨上都有所突破,可以运用墨色的深浅、浓淡拓制拓片。到清代,传拓技术进一步发展,制作的拓片更加精美,拓制范围不断扩大,种类和方法更加多样化,出现了青铜器的全形拓法,达到传拓技术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传拓技术发明于南北朝,成长于唐代,极盛于宋元明清。

清嘉庆年间,浙江嘉兴人马起凤开创了青铜器立体拓,后来达到受其发展弘扬,作品尤为时人所艳羨。其后,青铜器立体拓本技术日臻完善,民国年间处于极盛时期,当时传拓高手辈出,以周康元、马子云等为代表。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借鉴并运用西方素描及透视的方法,所拓制出的立体拓片在构图和用墨明暗变化上,已与素描、摄影十分接近了。

传拓的方法和种类

传拓方法包括擦拓和扑拓两种。

擦拓:用毡卷或扑子蘸墨后,在刷在碑上的纸上横向擦过,字迹就会出现纸上,这种拓法适用于平面物体,一般汉碑、唐碑都采用这种方法。如果原碑石表面不平整或有损毁,擦拓就不能很好地将原文蝉蜕下来,而会产生遗漏或模糊不清,因此在北宋间出现了扑拓的方法。

扑拓:就是用棉布或丝绸包裹棉花做成馒头形状的扑子上墨。擦拓改为扑拓,扑子的平面横向运动变为一上一下的纵向运动,这样就可以将凹凸不平的载体甚至曲面载体上的文字或纹饰拓下。

大致来说南宋以前多是擦拓,并且发明了蜡拓;到北宋发明了扑拓之法;到明代盛行朱拓,并出现镶拓和套色拓;清代民国所拓器物种类不断增多,金石玉器、甲骨陶器、汉砖瓦当、墓志碑刻无所不包。近现代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运用新的工具材料,推陈出新,方法更为先进。

传拓的种类包括墨拓和色拓两种;按其墨色深浅和使用材料的不同可分为乌金拓、蝉翼拓、镶拓、朱拓、套色拓等多种,种类不同,效果各异。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乌金拓、蝉翼拓、镶拓。

乌金拓:清代盛行墨拓的一种,拓片墨色厚重,黑白对比强烈,似乌金,黑亮晶莹,故名乌金拓。乌金拓须用较浓的油烟墨和洁白细腻的宣纸拓制,拓印时应特别注意上墨的时间和干湿的掌握,讲究前后层次的清晰分明。扑子蘸墨不宜过多,用墨宜浓。第一遍均匀上墨后,待其基本干透后再上第二遍,如此层层相加,层次分明,字口清晰,直至满意。《三希堂法帖》墨如点漆,光可鉴人,是乌金拓的代表之作。

蝉翼拓:又称蝉衣拓,墨色薄而均匀,如夏日鸣蝉的翅膀。蝉翼拓用纸要选择薄而细腻、韧性强的宣纸,用墨须精细,最好研墨拓制,如用现成墨汁,用前须加入适量清水稀释均匀。上墨前可将扑子在废宣纸上拍几下,吸去过多的墨汁。蝉翼拓应遵循宁浅勿深、宁淡勿浓、宁干勿湿、宁轻勿重的小原则。蝉翼拓最适合拓制精美的书画和比较小巧、纹理细致的器物。如《淳化阁帖》等,宣纸纹理清晰可见。

镶拓:利用墨的深浅、浓淡色彩拓制,多用于钱刻摹勒上石的绘画刻石。通过浓淡墨色,表现出石刻作品的艺术魅力。《兰亭图》拓本就是镶拓的代表之作。

除了严格意义上的传拓,还有一些特殊的技法,不必利用捶拓这一过程,亦能复制碑帖及器物的图纹,如双钩、颖拓等形似拓片,却不是拓片。

传拓的工具、材料及步骤

传拓用纸:宣纸。宣纸是纸张中一种高级的书画用纸。纸质细腻、柔软,以既薄又有韧性者为佳。宣纸产于唐代宣州泾县,在宣城集散,因而得名。宣纸有熟宣、生宣之分。熟宣加矾,生宣不加矾,拓片用纸一般采用生宣。这种拓片的特点是纤维长、纸质柔软、韧性大。传拓一般选用棉造纸,是宣纸的一种,根据所拓器物选择不同厚度纸张。棉连纸厚薄均匀,适宜拓印纹饰深、字体大的物件,如碑刻、墓志、瓦当、画像等。六吉棉连是纸中最薄的一种,质薄均匀,韧性强,适合拓甲骨、玉器以及纤细的图案,为传拓材料纸



中之佳品。竹纸也是宣纸的一种,是以嫩竹为原料制造,纸质薄,拓制出的拓片非常光亮精美,但是上墨后纸质脆,不利于拓片的保存。

墨有两类:即松烟墨和油烟墨。松烟墨,墨色浓而无光,见水后易渗化,仅宜写字,不宜拓印。拓片用墨以油烟墨为好。过去拓印都是自己捣墨,太多用不完,太少不好捣,既不方便又不经济,现在已无人捣墨,都用北京的“一得阁”墨汁。由于墨汁胶性大,容易形成扑包堵塞,出墨较难,所以在拓印过程中要尽量使扑包保持湿润,使其出墨流畅。

棕刷:又叫平刷,传拓上纸时使用。

打刷:也叫砸刷,传拓上纸时使用。大的用来打制碑石、墓志等大型器物;小的用于打制甲骨、玉石等小型器物。

橡皮锤:拓碑的锤子一般选用橡皮锤。橡皮锤弹性好,易于捶打,不会伤及器物,但不适用小型器物。

扑子:又叫扑包,是上墨的主要工具。大扑子用来拓制大器物,小扑子用来拓制小器物。

白芨:其药用部分是根茎,将其切成薄片浸泡在水里,浸泡后的液体无色透明,能使水产生黏性,是传拓用的一种绝好的绿色天然植物,对所拓器物无污染无伤害,白芨色白片薄为上,使用时先取一器皿,放入白芨,再加上适量水浸泡。白芨浸泡的时间长短不同,水的黏稠性也不同,要根据所拓器物而定,宜损、宜裂者不宜黏稠,白芨水易变质,不宜久放。

砚台:主要用来研墨,一般传拓小器物才使用、传拓使用的砚台,要求石质细腻,光滑润泽,宜大宜平,以端砚、歙砚为佳。研墨时一定要使用干净的水,顺时针重按轻磨,研磨好的墨汁不能隔夜,当天一定要清洗干净,不然会影响传拓效果和伤及砚台。

传拓的步骤:传统的传拓包括洗碑、上纸、上墨和揭取四个步骤。

第一步洗碑:在传拓之前将器物清洗干净,文字内或纹饰中

遇有锈迹,先用竹杆慢慢剔除,切忌用金属利器,以防损伤器物。清理后的器物一定要使文字、图像、花纹清楚、明晰。器物洗干净后,要将器物放平、放稳。

第二步上纸:上纸有干纸法和湿纸法两种,根据器物类型的不同,上纸方法也不同。在拓制石碑、墓志等稍大刻石时,一般采用湿纸法。湿纸前,应先量好所拓石碑的尺寸,然后裁纸,纸要裁得略大于器物,将纸叠好,准备好毛巾,将一张叠好的干纸放在毛巾上,然后将浸过清水的湿纸放在干纸上,如此交错放置,最后将毛巾包好,双手轻压四角,使纸干湿均匀。摩崖、玉器、古墨等都可以采用湿纸上纸法。造像、青铜器物、甲骨、钱币等可采用干纸法上纸。

第三步上墨:也叫扑墨,就是用扑子蘸墨,将墨均匀地拍击在宣纸上,所拓器物的文字或纹饰就会因凸凹处着墨、凹陷处不着墨而显现出黑白分明的线条,阴刻的碑版就会呈现出黑纸白字来,阳刻则相反。上墨时要掌握好纸的干湿程度,待湿纸由青变白、欲干未干时,用扑子轻轻拍打上第一遍墨,这一遍墨要淡、要匀,使文字或图案稍稍显露,待纸全干时,再上第二遍、第三遍……依次渐进,层层加深,一般的拓片拓四五遍即可。

第四步拓片的揭取:当拓片终止上墨,完全干透后,方可揭取。一般来讲,只要所拓器物清理得干净,揭取就非常容易,有时不揭也会自然脱落。揭下拓片后,将其铺在一个平台上,正面朝下,附上衬纸,用棕刷将其展平。一张完好的拓片制作就完成了。

拓制好的拓片,其保存是非常重要的,可整幅折叠、可做册本保存。保存拓片首先要防潮、防蛀。国家图书馆所藏拓片目前采用四衬法,衬以宣纸保存,易折叠,不易损伤拓片,均在恒温恒湿的库房中保存。装裱好的卷轴装拓片不宜长期悬挂,要定期更换。

(本文根据袁玉红在北京东城区第一图书馆所做讲座内容整理,内容有删减)

私家藏目向图书馆公藏书目过渡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 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简史(一)

□徐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总编辑)

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以下简称缪目),是国家图书馆第一部古籍善本书目,同时也是第一次以“善本”命名的中国古籍书目。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号筱珊,又作小山,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缪荃孙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精通金石、目录、考据、校勘之学,而且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参与创办了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缪目是近代图书馆建立后,顺应公藏图书的度藏、整理、流通以及保护诸方面的需要而编纂的。宣统二年(1910),学部颁布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第七至九条规定:

“图书馆收藏图书,分为两类:一为保存之类;一为观览之类。”

“凡内府秘籍、海内孤本、宋元旧契、精抄之本,皆在应保存之类。保存图书,别藏一室。由馆每月择定时期,另备券据,以便学人展视。如有发明图书堪资考订者,由图书馆影写、刊印、抄录,编入观览之类,供人随意浏览。”

“凡中国官私通行图书、海外各国图书,皆为观览之类。观览图书,任人领取翻阅,惟不得污损剪裁及携出馆外。”

很明显,《章程》所谓保存类图书即为善本,观览类图书则为普通本。其对二者分别规定的保存和阅览制度,被国家图书馆和省借借、沿用了几百年之久。当然,分别编制善本书目和普通本书目,也就成为惯例,这才有了国家图书馆的七部善本书目。

编纂善本书目,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善本,《章程》虽有“内府秘籍、海内孤本、宋元旧契、精抄之本”之说,却过于笼统,且与明清以来藏书家的善本观多有雷同。对此,缪氏没有明确的论述,但他的编目实践却回答了上述问题。缪目共收录经史子集四部书773部,其中宋刻本113部,元刻本186部,金刻本2部,明刻本204部,清刻本13部,影宋刻本1部,影宋抄本8部,影元刻本1部,影元抄本2部,其他各类抄本227部,稿本9部,活字本3部,朝鲜(高丽)刻本4部。从中可以看出,缪目收录了大量明刻本以及十几部清刻本,与明清时期藏书家只重宋元本和稿抄本相比,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据缪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中记载,从宣统二年(1910)“十月廿五日癸未,到图书馆开箱(看书)”,至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二日丙戌,赴学部交书目、乞假”,全部编目过程仅耗时11个月。那么,缪氏编目时的京师图书馆馆藏状况如何呢?据《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等资料记载,宣统二年至三年(1910~1911),京师图书馆的基本馆藏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 清内閣大库残帙,主要是其中的历代典籍。
2. 归安姚氏及南陵徐氏藏书。两江总督端方得知张之洞拟创建京师图书馆,特采进姚氏爬进斋和徐乃昌积学斋藏书,以充实馆藏。据端方《奏江南图书馆购买书价请分别筹给片》记载:购得姚氏藏书1011种,徐氏藏书641种,共计12090

余卷,分装180箱,合编目录一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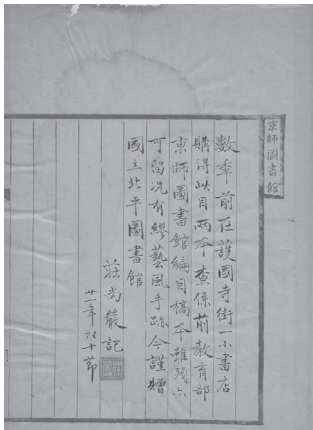
3. 常熟瞿氏进呈藏书。京师图书馆筹建期间,端方拟购进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未果,改为抄书配以旧刊本进呈。至宣统三年(1911),抄成37种,加旧刊本13种,共50种,交与京师图书馆。

以上三项图书总计5053部,加上自购和各地捐赠之书,与1913年1月30日京师图书馆呈教育部《造送书籍数目册》统计的5424部相接近。基本相符(《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086页)。缪目之所以能够快速成书,得益于各类藏书均有目录可以考核、借鉴。对此,林振岳的《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编纂考》(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缪荃孙诞辰17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曾予论证,其结论是:“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一书,主要是根据曹元忠《文华殿检书分档》(即内閣大库书目之一种)、姚觐元《咫进斋善本书目》、瞿鏞《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三种书目改编而成,造成此目体例不一的原因也在此:因利用曹稿,故目中有提要之例;因沿用姚目,故留下了过录善本题跋的体例”。此说言之有据,但反观清代至民国年间,私家藏目研究型居多:热衷于标注行款及版式、过录序跋、识读藏印、梳理递藏、校勘文字、甄别避讳、考证版本。然而,因古籍版本各自的差异性,书目编纂者的嗜好、侧重不同,以及能力、精力所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造成了条目之间篇幅和体例的较大差别,故由私家藏目向图书馆公藏书目过渡的缪目,较多保存了私家藏目的特征,亦不足为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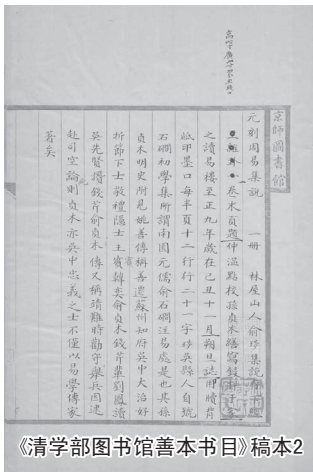
缪氏的主要功绩,在其短时间内从5000多部馆藏中将精品遴选出来,落实了善本、普本分别编目、度藏的制度;确立了图书馆公藏目录正本、副本逐书登记的编目方法,保障了馆藏资产的安全,为此后江瀚、夏曾佑的《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奠定了基础。以上两点,也充分证明缪荃孙具有深厚的文献学及版本目录学功底,以及在建设近代图书馆方面所具备的独特眼光。

当然,因时间仓促、编目人手不足等原因,缪目也难免出现一些差错。例如《列子》错入儒家类,应属道家类;《意林注》错入儒家类,应入杂家类,故夏目云“缪目无此书,江目有”,其实是缪目分错了类,并非无此书;集部《贾长沙集》即贾谊《新书》,应入子部儒家类;《资治通鉴纲目》和《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两书不同本子的条目均未在一处;《通鉴释文辨误》,略为《释文辨误》;《本草原流》错为《本草原流》;《百将传》“朝鲜刊本”错为“青鲜刊本”,等等,不一而足。但瑕不掩瑜,缪目在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制中的筚路蓝缕之功,当永载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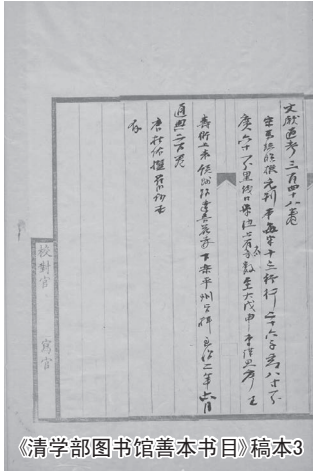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刊载于1912年6月出版的《古学汇刊》第一编。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有该书目稿本两册,书页上有缪荃孙批改手迹,书前有庄尚严墨笔题跋,曰:“数年前在护国寺街一小书店购得此目两本,查系前教育部京师图书馆编目稿本,虽残,亦可留。况有缪荃孙手迹,今谨赠国立北平图书馆。廿一年双十节。”从该稿本中可见曹元忠、瞿鏞三目及缪氏审阅批改之端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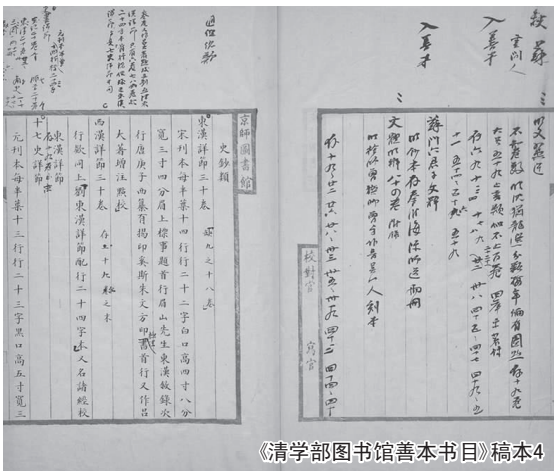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1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2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3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4

绍兴图书馆之馆藏珍贵古籍 越地典藏 精品荟萃

绍兴图书馆的前身是乡绅徐树兰于1902年独资创建的古越藏书楼，它是近代第一所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私家藏书楼。该馆历经百年发展，跨越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目前拥有古籍约15万册。元刊明槧，官刻私钜，活字套版，稿抄批校，流传有绪，诸体皆备，是几代馆人苦心收集保存下来的珍贵典藏。

古越藏书楼旧藏是该馆古籍的主要来源。徐树兰先生建楼之后，便“将家藏经史大部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入”，“所有近来译本新书，以及图画、标本、雅驯报章，亦复捐资购备”。

同时特别推出“存书之例”，特地申明“以限于财力，未能完备，有愿出资助益及帮助书籍者，均拜嘉惠”，号召社会有识人士捐书。民国时期，藏书楼由私立转公办，改组为“绍兴县立图书馆”。据1936年统计，藏书为7.9万册，其中通常类图书逾5000册。抗战胜利后，为充实馆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用筹得善款从沪杭两地购得图书700余种，略增馆藏。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界对图书馆的捐书资助更是绵延不绝，极大地丰富了馆藏，精细备陈，善本盈橱。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

划”启动实施以来，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等有关部门的悉心指导下，绍兴市古籍保护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截至2018年，绍兴图书馆共有22部馆藏珍品入选一至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包括《唐柳先生集》《乐府诗集》《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国朝文类》四种元刻本，堪称镇馆之宝。另有44部古籍入选一至四批《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入选古籍中既有（明）祁彪佳《救荒全书》、（清）张岱《快园道古》、（清）傅以礼《史抄》、（清）周师濂《沧海遗珠》等地方

稀见稿抄本，亦包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氏香雪居刻本《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诸暨陈善学刻本《杨铁崖先生文集》、明崇祯八年（1635）李为芝刻本《小柴桑喃喃录》等传本稀见、版刻精良的地方珍本。这些入选名录的善本古籍，集中体现了该馆藏品精华。

绍兴素负人文渊薮之誉，乡邦文献宏富亦为该馆独特优势。藏品荟萃了徐氏古越藏书楼、董氏取斯堂、周氏治经堂、胡氏听雨楼、马氏含经室、沈氏起先楼、陶氏天放楼、童氏养庐、施氏乐寿堂、寿氏三味书屋等清季

至民国古越诸多藏家精华，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学术价值，无论数量抑或质量，在浙江省地市级一级图书馆中，皆属上乘。其中不少藏品或出绍兴名士李慈铭、赵之谦、陶方琦、杜亚泉等手书墨迹，或见越中藏书名家如澹生堂主人祁承、鸣野山房主人沈复棠铃印，朱墨灿然，珍贵逾恒。“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所存资料”亦是该馆最富地方特色的专题文献之一，它翔实地记载了从清代中晚期至民国时期（至1940年）绍兴独特的地方风貌，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绍兴图书馆供稿）

【精品举要】

1.《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

四十三卷 别集二卷 外集二卷 年谱一卷 附录一卷（唐）柳宗元撰（宋）童宗说注释（宋）张敦颐音辨（宋）潘纬音义 元末明初刻本

本书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诗文全集，是存世柳诗集中较早的版本。曾于2007年参加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第一期“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乐府诗集》

一百卷 目录二卷（宋）郭茂倩编 元至正元年（1341）集庆路儒学刻本

本书是一部成书较早，收录历代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乐府总集。有元一代，各路儒学刻书兴盛，是书即为代表。曾为明末清初知名藏书楼常熟毛氏汲古阁旧藏，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3.《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

前集十卷 后集十卷（元）黄坚辑 元刻本

本书是元代黄坚编纂的历代诗文选集。约编成于元初，元明时期风行一时，对中、日、韩三国均有广泛影响，明末以后几近佚失。此版本为该书现存年代最早之版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4.《国朝文类》

七十卷（元）苏天爵辑 元刻本

本书是元人文集。辑者苏天爵效法萧统《文选》，搜集元初至延祐间名公及闻人逸士之著述，类而聚之，编订此书。元陈旅（江浙儒学副提举）评之曰“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5.《新校注古本西厢记》

五卷 汇考一卷（元）王实甫撰（明）王骥德校注（明）徐渭附解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氏香雪居刻本

本书是一本元杂剧。王骥德在徐文长本的基础上，采用当时颇有影响的碧筠斋本、朱石津本、金在衡本、徐士范本、顾玄纬本等多种善本进行校勘，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

6.《杨铁崖先生文集》

十一卷 附铁笛清江引一卷（元）杨维禎撰（明）陈继儒校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诸暨陈善学刻本

杨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他长于乐府诗，有很多咏史、拟古之作，亦有不少反映客观生活、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本集收其古乐府八卷、古赋三卷，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

7.《小柴桑喃喃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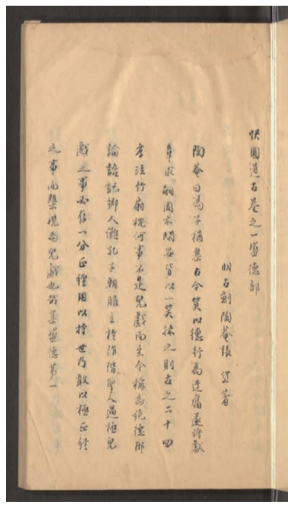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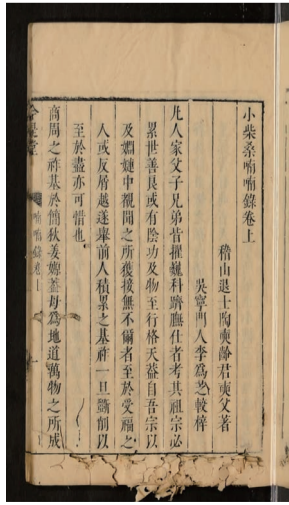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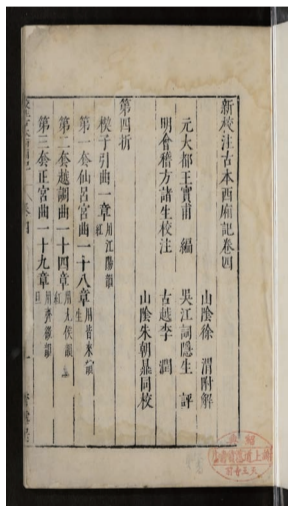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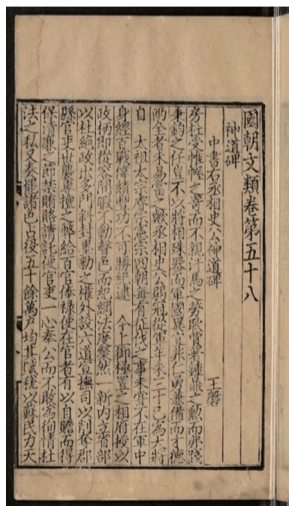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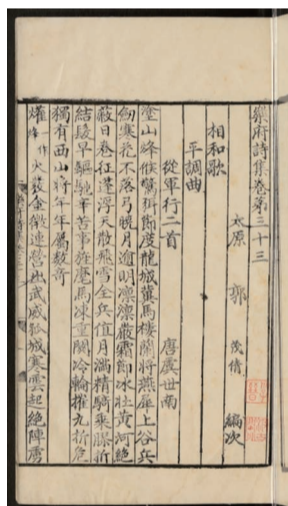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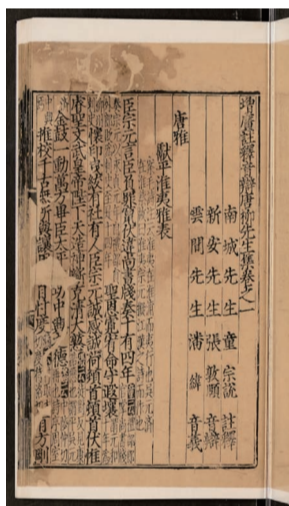
二卷（明）陶奭龄撰 明崇祯八年（1635）李为芝刻本

本书叙述明末士大夫奢侈浪费、剥削小民的情况，同时还记述了明代地方戏的兴盛。作者乃柴桑人，书中主要谈自己的阅历和对子孙的教导，故用“小柴桑”字样，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

8.《快园道古》

二十卷（清）张岱撰 清道光抄本

本书是一部仿《世说新语》体例的著作，资料广博，内容繁富，涉及晚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多张岱本人、亲属、先世及当时一些时间逸事的记载，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及对张岱本人的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



左上至右下依次为：
1.《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
2.《乐府诗集》
3.《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
4.《国朝文类》
5.《新校注古本西厢记》
6.《杨铁崖先生文集》
7.《小柴桑喃喃录》
8.《快园道古》